

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初探

张 星 久

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的根本社会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准则的稳定,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秩序化。政治稳定具有度的方面和层次方面的规定性:它应是发展的稳定,动态的平衡,而非绝对静止;它应是带全局性、根本性的稳定,而非一切方面的稳定;稳定不是终极目标,它必须以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心任务为限。实现政治稳定,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此,尤其要注意坚决反右,主要反“左”,以消除引发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政治稳定问题是当代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践遇到的相当棘手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以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出色的回答。鉴于目前对他这一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又使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因此本文选取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这一问题试作讨论,应当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一、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是对“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是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方针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本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初期就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城市、管理工业,把工作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不但要善于破坏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党的“八大”会议更明确提出,要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应当说,直到1957年“反右”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上,认识都是比较清醒的,但不久就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加上在实际工作中总是不自觉地沿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去处理新形势下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偏离正确的轨道,走向了“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死胡同,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面动乱,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作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和整个国家一同饱尝了动乱之苦,更能体会到恢复政治秩序以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当毛泽东同志终于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让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时,他便顶住各种压力,展开了全面的

整顿工作,以期尽快恢复各个方面的秩序,使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走上正轨。虽然这次整顿不久便被新一轮批邓声浪所淹没,但它却是力图恢复“八大”路线的尝试,也是后来的历史性转变的预演。

1977年重新出来工作后,历史终于赋予邓小平全面结束动乱、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时机和条件。经历过这一次政治上的反复,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对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的政治稳定问题,在思想上更加明确和深刻了。正如他所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②。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恢复工作不久就以推动思想解放为突破口,展开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提出了以加快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也为未来的政治稳定格局确立了最高准则和政治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一方面,由于人们长期习惯于旧的体制和旧的思维模式,“左”的余毒在有些方面还根深蒂固,造成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危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对外联系与交往,也难免会在一部分人中滋生向往资本主义、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思潮,成为干扰改革开放,影响政治稳定的另一危害因素。所以,从80年代初一直到南巡讲话,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两种情况,邓小平总是不失时机地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主要反“左”、同时又警惕右和坚决反右的原则,以保持必要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这样,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也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总之,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是在拨乱反正、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丰富和系统化的。

二、政治稳定的含义与特征

在阐述自己的政治稳定思想时,邓小平使用较多的是“安定团结”这一措词,有时也使用诸如“秩序”、“政局稳定”等其他措词。如他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已经渡过了林彪、“四人帮”设下的一个个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的国家”^③;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又指出,为了在下个世纪达到人均产值400美元的发展目标,就要保持“两个稳定”,“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④,等等。表述的措词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着“四个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心展开的。具体而言,政治稳定在邓小平整个思想体系中应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基本政治格局的稳定。这意味着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质特点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稳定,意味着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被动摇,意味着我国的政治生活不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不能摆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实际上也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四个坚持”的具体内容。他多次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如果没有这“四个坚持”,中国就会四分五裂,天下大乱,就会一事无成,正是从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所确立的根本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的这一意义来阐述政治稳定的。

其次,政治稳定又是指维系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规范国家政治运行方向和秩序的最高政治准则的稳定,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政治格局的安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规范我国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坚持这个最高准则,首先必须顽强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其次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个不变”,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不变,为此要注意在工作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要注意反“左”。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使党的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全国人民政治认同的基础,避免因政策反复而引发的政治不稳定。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加明确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也就包含着强调稳定政策、稳定大局的意图。

第三,政治稳定又是指国家政治生活各方面的一种正规化、秩序化状态。它首先表现为具有一套稳定而可供遵循的法制体系,以调节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行为。鉴于我国曾有一段漫长的封建历史,建国后又一度忽视民主法制建设,以致出现“文革”时期那种无法无天的现象,邓小平作为一个过来人,深感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健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⑤。因此,他反复强调,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与法制,强化法制的尊严和稳定性,反对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使社会主义的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政治生活的秩序化。

这种政治生活的秩序化表现在体制方面,就是要做到政治体制在组织机构和权力配置方面的合理化,有序化,使其具有较高效能和活力。为此,不仅要大力精简机构,解决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在权力配置方面,要改变以往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把理顺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分开放在机构改革的第一位。同时,还要扭转那种“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党委的权力又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⑥的现象,大胆下放权力。另外还要注意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增强整个体制的活力。

以上几个层次意义的政治稳定,实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局稳定、大政方针的稳定和政局的稳定。显然,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各方面的静止、停滞。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

(一)粉碎“四人帮”以来,邓小平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说是集中在一方面抓安定团结,一方面抓改革开放,以便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政治稳定与改革在其实践中是高度统一的。

(二)他在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反复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步伐和力度。比如在1987年关于《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讲究稳妥,但稳定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在南巡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

(三)他在强调安定团结的同时,又反复强调要生动活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坚决主张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增强活力,提倡要有新脑筋,新语言,反对思想僵化。

(四)邓小平之所以高度重视政治稳定问题,绝非为稳定而谈稳定,而是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在他看来,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诸多任务中居压倒一切地位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要格外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政治稳定的重要,恰恰在于发展经济的重要。

所以,通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说明在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中,政治稳定还存在着一个度的和层次上的规定性问题,存在着正确把握几个方面辩证统一关系问题。

首先,政治稳定既然是指政治大局、大政方针、根本政治制度的稳定,因而也就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稳定,而不是指一切方面、一切系统的稳定,不是一切绝对静止不变。不能因为一提政治稳定,就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动,更不能借口稳定,听任党内腐败和不正之风蔓延滋

长。因此,政治稳定的“度”,正在于它必须以不妨碍、牺牲改革开放为限。

其次,要处理好稳定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政治稳定本身不是目的,它必须服务于中心任务,并通过中心任务的实现进一步实现稳定,而经济建设也只有在基本的政治稳定前提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二者是高度统一的;然而,经济发展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稳定,也不会自发地导致政治稳定,因此在强调抓中心任务的同时,又要强调注意政治稳定问题,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因此二者关系又是辩证的。所以,政治稳定的“度”又表现为,它必须以能够保障和有利于实现中心任务为限。

第三,要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稳定既然是涉及国家政治生活根本性、全局性方面的稳定和有序状态,它不仅不排斥在根本稳定前提下的局部政治改革,相反会对这种改革有一种内在的、迫切的需要,以此来增强体制的活力和效能,实现体制在稳定、有序状态下的良性运转。这正是邓小平之所以既不断强调政治稳定又坚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但在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过于超前,超过了体制的承受能力,又可能危及政治稳定。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一步步地前进,改革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也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因此,政治稳定的“度”在此又表现为,其“平衡性”必须以不窒息政治体制的活力为限,其“动态性”(即根本稳定前提下的改革)必须以不危及政治稳定、不超过体制的承受力为限。

总之,从邓小平的政治稳定观来看,稳定应是发展中的稳定,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稳定,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是一种具有度的和层次方面规定性的稳定。

三、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经济落后)和中心任务(发展经济)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邓小平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更深刻的革命,是一场“伟大试验”,“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情”^[2]。站在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交汇点上理解邓小平这一论断,确实感到意蕴深长。事实上,中国的改革确实正处在这样一种历史时空中:第一,它发生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负载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国度;第二,它发生在一个曾经走过弯路、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它发生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已持续几百年之久,而且至今又在向纵深跃动的时代(有人称这一时代为“第三次浪潮”或“新技术革命时代”等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将是异常艰巨、空前复杂的。它既要花大力气去调整与固有传统之间的关系,克服其劣性,催发其活力;又要调整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克服基于这一体制尚不完善、不成熟而形成的不良传统;又要调整中国与外部的关系,使中国在追求现代化、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吸收消化功能,同时又能在强大的外部挑战和发展落差面前,稳住阵脚,保持平衡,在实现一个现代国家的共性时,凸现自己的民族个性与政治个性(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实现这一系列目标的过程中,又必然会伴随着诸如思想解放、传统变革、社会变迁、政治民主、都市化、商品化等问题的纷至沓来。从事如此深刻复杂的伟大变革,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有领导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只能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经过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不断探索和艰苦努力才能实现。而对那种习惯于把“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当成万应灵药解决中国问题的做法,或者是靠“大民主”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文

化大革命”早就以其惨痛的记录亮起了红灯：此路不通。所以，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而改革没有政治稳定也没有出路，这正是邓小平所要昭示于这个时代的。

如何实现政治稳定？首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消除可能出现的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倾向，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基本路线。因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规定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格局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坚持了这一基本路线，也就意味着抓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没有变，改革开放没有变，也就是政治大局的稳定。这一思想在邓小平的历次讲话中都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至于实现政治稳定的具体途径，也是要围绕实现这一基本路线而展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冲击、干扰党的基本路线，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危险，既来自右的方面，表现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政治动乱；也来自“左”的方面，表现为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干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因此，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吃亏主要是在“左”，根深蒂固的是“左”，因此重点反“左”。这一思想邓小平在80年代初讲过，在1987年的几次谈话中讲过，在南巡讲话中又再次强调。可见，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右的和“左”的方面的错误都可能成为扰乱大局的不稳定因素，其中，“左”的错误又是引发政治不稳定的更主要因素。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对右的危害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容易认识和理解，而对“左”的危害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却往往忽视。因此，认真领会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不稳定因素，探讨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应当是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二）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认为，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贫穷落后，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⑧。如果社会主义老是摆脱不了贫困，“它就站不住”^⑨；如果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只有摆脱了贫困，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才能“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从而消除自由化和政治动乱的根源。从这个意义说，经济发展对于避免或减少动乱确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艺术性，以把握基本的平衡与稳定。邓小平谆谆告诫人们，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也是实现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变”的同时，对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不变”。但在具体处理自由化问题和制止动乱的时候，又强调要提高艺术性，严格把握分寸，坚决不搞运动。这是因为，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反自由化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他在谈及1987年的中央人事变动时说，我们历来对待这样的事总是过分，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对反自由化的问题“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这说明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反自由化问题应是有分寸、有界限的，如果在处理政治稳定和应付突发事件上反应过当，夸大问题的范围程度，甚至再用“文革”搞运动的手段去处理，势必是“阶级斗争为纲”、“运动治国”的悲剧重新登场，不仅不会制止动乱，反而会以乱易乱，这是与安定团结的精神相背道而驰的。

（四）坚持改革开放，维持政治体制在发展中的稳定。关于政治稳定与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在前面探讨邓小平政治稳定观的含义时已经作了说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关于改

改革开放与政治稳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仅是全面考察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所得到的应有之意,而且也直接见诸于他的一些谈话中。如:他在谈及农村的改革时就指出,改革之所以先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村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面就不稳定”。显然,这是把改革作为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看待的。在南巡讲话更明确地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可见,改革开放既是强国之路,也是通往政治稳定之路。

此外,在阐述自己的政治稳定思想时,邓小平还强调要注意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消除党内腐败现象,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等等,也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具体步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下,认真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综观以上所说可以看出,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又系统的。它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稳定的规律性认识,代表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的一种冷峻而明智的沉思,是一个饱尝动乱的民族在苦难中孕育出的绚烂精神之花,它必将成为我国政治稳定理论体系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

注 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②③⑤⑥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7、293、289、176页。
-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217页。
- ⑦⑧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53页。

(责任编辑 叶娟丽)